

史记

文化符号论

齐效斌 著



责任编辑 冯晓立
装帧设计 徐明
责任校对 王丽娜

ISBN 7-5613-1795-6



9 787561 317952 >

ISBN 7 - 5613 - 1795 - 6
G • 1343 定价：12.00元

《史记》文化符号论

齐效斌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16900

《史记》文化符号论

齐效斌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潼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25 字数 156 千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613-1795-6/G·1343

定 价:12.0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序

畅 广 元

丁丑岁末，效斌送来了他的书稿《〈史记〉文化符号论》，嘱我为其写“序”。效斌从事《史记》的符号学研究很有些时日了，他发表的不少学术论文我都读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认为，他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研究《史记》，不仅可以开拓出《史记》研究的新路子，而且对中西学的交汇互用也会积累下有借鉴意义的经验。现在，他把自己几年来精心研究的成果写成专著，有了较为完整的系统性，读后越发令人耳目一新，的确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好书。

效斌勤学好思。1969年他大学毕业，在那个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年代里，尽管他也受到诸多方面的干扰，可他始终没有忘记读书。从解放军农场锻炼归来，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一搞就是十余年。这期间，文学概论课数易教材却并不能满足同学们的需要，更不适应发展迅速的现实，教与学两方面都强烈要求重新编写教材。效斌身处教学第一线，对此早有觉察，是时他已经在悄悄地钻研文化符号学的有关著作，并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其学理来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当我们决定编写《文艺学导论》时，他欣然接受了“文学文

本及其构成”的撰写任务。这是他在教材中首次运用符号学原理论述文学文本,对《史记》的符号学研究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我之所以说他勤学好思,是有感于他在这十余年间学术行为所呈现的如下特点:首先,他非常重视自己学术视野的扩展。改革开放以来,西学大量涌进,不少学人面对这种情况,很是茫然了一阵子。效斌却不是这样,他意识到人文学者绝不能眼界狭窄,对自己尚不熟悉的西学,应当去认识而不是排斥它。他就是本着这样的态度对20世纪西方文艺学诸多学派的著作进行认真研读,结果并不是受了什么毒害,而是获益匪浅,使他能够多角度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学术眼界大为扩展;其次,他能深入研究。有的学人喜欢趋时,什么时髦就研究什么,结果“蝌蚪跟着鱼儿浪,浪得自己没了尾巴”。效斌在了解西方诸多文艺学学派的理论基础,抓住了符号学深入钻研下去,力求把它弄通搞精,并形成自己的见解和治学的方法,这就很不容易;再次,他潜心于中西学的互用研究,不作空头理论家。这本《〈史记〉文化符号论》即是明证。关于《史记》研究,国内学界从史学与文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的成果是十分丰硕的。换一个角度看《史记》,学术上出新自不待言;但能如效斌这样从文化符号学中提炼出一种方法,并把《史记》看作是历史符号与心灵符号的结合,是民族文化精神符号与作家主体精神符号的结合而进行研究的,却是首创,其价值绝不囿于《史记》研究领域,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互补上,它更显示出自己独特的意义。出此成果者,怎能

不是勤学好思人呢？

《〈史记〉文化符号论》这本书读者读了肯定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关于《史记》的符号学特征与阐释，司马迁的思维逻辑与《史记》的符号空间，《史记》的叙事结构分析等篇章，还有作者独具己见的关于《史记》典型人物的阐释，一定会让读者领悟到不同旧说的启迪，并从中体会到关于《史记》文化符号学研究的特色与方法。我相信效斌同志的这本书不仅会推动《史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利于人们深入思考西方文化与文论同中国文论建设的关系，为寻找建设中国文论的新路径提供个案性经验。

这是效斌同志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开始的这一步他走得坚定、实在，其良好学风足让人们有信心在可见的未来会读到他的新的学术著作。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1998年春节于陕西师大

自序

《〈史记〉文化符号论》一书是从去年暑假动笔,到今年年初写成,历时八个月之久。实际上,关于此书的构想从1993年5月陕西省第一届司马迁学术思想讨论会已开始酝酿了,由于种种原因,书稿一拖再拖,只好写一部分(篇)发一部分(篇),其中《史记人物传记的符号学特征与阐释》被北京大学学报转摘,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去年暑假开始便依原编写计划对未完成的大部分章节集中时间撰写,之后又对已发表的几篇进行改写,以适应整部著作的整一性、系统性要求。现在终于脱稿,不禁长出一口气。

从体例上看,全书由导论和八章构成。导论从“任何一部文化典籍皆可置于文化符号学的框架之中加以研究,因为任何一部文化典籍都是特定时代文化精神与语言符号形式的结合体”论起,围绕《史记》本体结构特征和方法论问题,阐明《史记》符号论何以可能的理由,以及基本方向和侧重点等问题;第一章论述《史记》文本的符号学特征,认为《史记》是兼有诗学编码和逻辑编码双重性质的文本,关于它的阐释原则既不同于科学文本也不同于纯文学文本,而是在科学意识支配下对历史文本的有限阐释;第二章则具体论述《史记》本体论维度及其意识形态模式,侧重于说明司马迁的主体心灵符号对历史符号合成中的作用,这也就是他的历史观念;第三章论述司马迁的矛盾型思维形态与《史记》构造的符号体系之间内在的逻辑性,从而判定司马迁的哲学不是一种诠释性哲学,而是一种疑问性哲学;第四章试用精神分析法研究司马迁的无意识领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精神分析是现代象征学也就是文化符号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他首倡并总结的“发愤著作”精神则是性压

抑得到转移的结果;第五章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为启示点展开对司马迁存在意识的评述。尽管他面临许多矛盾,但最终以道家思维的方式肯定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实现了历史为自我而存在,自我为历史而存在的双重目标;第六章对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做出界定,并对《史记》的叙事逻辑及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后者实质上是对叙事学理论的具体运用;第七章是对典型人物的分析,认为《史记》中的人物一方面是历史实存人物,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精神实体,蕴涵着较为深刻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可以起到检讨过去昭示未来的作用;第八章是神话—原型研究。神话研究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文化符号学的一个方面。《史记》中的神话,一方面是历史,另一方面又是文化“记号”,一种语言,一种叙事方式。

多年来,我一直在自己极感兴趣的符号学领域学习,同时也作一些研究。尽管成绩有限,但还是体现着符号学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是符号学理论的研究,为此我写过一些论文,并且还把符号学精神灌输到参编的专著《文艺学导论》之中;另一个是应用符号学或部门符号研究,我将它施之于文艺学和《史记》这一历史学研究之中,现在写出的这本小书,试图体现自己这方面的努力,连自己也不十分满意,充其量是个尝试,错误与缺陷在所难免,期望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最后,谨向对我的学习和研究一贯关心和鼓励的畅广元教授表示衷心感谢,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了序,使我深受感动。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高经纬、总编辑刘明琪、责任编辑冯晓立诸位先生致以谢意。师大成人教育学院卫蒲宁、肖宁、吕现斌、金友渔为我打印稿件,为使语言文字符号输入软盘,做了大量的烦琐的工作,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作,同样表示谢意。无疑,没有他们的友情和帮助,本书是难以问世的。

齐效斌 1998年春节于陕西师大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史记》的符号学特征与阐释	(13)
一、两种思维的互渗性:人物的符号学特征	(14)
二、所指优势与能指优势	(17)
三、《史记》文本的阐释原则	(25)
第二章 《史记》的本体论维度与意识形态模式	(28)
一、统一天下的历史事实与“文化革命”的主体愿望	(28)
二、社会有机体、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模式	(32)
三、五体结构的文化涵义与司马迁的整合原则	(39)
四、成一家言的运思方式	(43)
第三章 司马迁的思维逻辑与《史记》的符号结构空间	(48)
一、以模糊性为表征的矛盾型思维逻辑	(48)
二、矛盾型思维逻辑的成因	(52)
三、《史记》的符号结构空间	(55)
第四章 发愤著作效应及其精神分析	(61)
一、“发愤著作”形成的社会因素	(62)
二、“发愤著作”形成的心理因素(一): 性压抑的第一次转移	(66)
三、“发愤著作”形成的心理因素(二): 性压抑的第二次转移	(72)
第五章 道与司马迁的存在意识	(77)
一、作为儒家之道的生存意识	(79)

二、生存意识的觉醒	(82)
三、新的生存意识的内涵	(86)
四、语言是存在之家	(88)
第六章 《史记》的叙事结构分析	(91)
一、叙事界限与叙事逻辑	(92)
二、历史话语与叙事模式	(105)
第七章 阅读典型	(116)
一、阅读视野嬗变中的《伯夷列传》	(117)
二、两个两重奏中的西楚霸王	(126)
三、忍：强者的哲学——以越王勾践为例	(137)
四、隐：智者的哲学——以张良范蠡为例	(144)
第八章 《史记》的神话—原型研究	(151)
一、《史记》中的神话类别	(151)
二、神话思维与司马迁的神话观念	(153)
三、神话与语言	(158)
四、神话—原型阐释	(162)
五、神话的功能结构	(169)
附：《史记》研究方法论管见	(175)
主要参考文献	(187)

导论：文化符号学的界定与 《史记》文化符号论的可能性

一

什么是符号？这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却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因为符号是文化的载体。在现代符号学理论中，符号一般被命定为某事物的指代物，而用专门的术语表达，符号是其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能指构成表达面，所指构成内容面”，这是索绪尔传统中的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对符号涵义的界定，学术界大多倾向于这一看法。以符号作为研究对象或再具体一点说，凡是研究记号生成和规律的科学就称之为符号学。

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是人类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人有必要也有可能使自己以此与动物相区别。所以，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与符号结下不解之缘。可以断定，人世间的一切文化产品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创造出来的，当然，反过来说，物质和精神的高度文明又促进了符号的成熟与发展。可见，人类的文化知识和符号成熟程度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这是符号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发展。

在谈到文化符号学时，人们往往以为它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大的一个分支，属于部门符号学研究。不过，这仅仅是关于文化符号学的狭义理解。而广义的概念则是指以一切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想为对象的研究。本文所讲的文化符

号学既是狭义的又是泛称的:《史记》文本作为历史学研究时,属于部门符号学研究,但《史记》是对汉以前语言、神话等文化现象的反映,本身又是以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因此,这里的文化符号应界定为指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与思想的符号学研究。这一点,既区别于对不限于语言对象的符号学研究,同时又区别于对以“纯”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研究。而且,人类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产品固然是文化现象的对应物,却未必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文化符号学的对象就是体现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这样的文化典籍同时又是特定时代文化精神与语言等符号形式的结合,具有完整形式的文本,《史记》在体现这一特征方面当之无愧。尽管如此,笔者仍嫌失之宽泛,按照《史记》文本的代码结构特征,我们选取的是体现文化思想的类型和结构,侧重记号、类型和结构意义的分析,使其不同于一般的思想文化研究,换言之,本著作研究的目标是《史记》文化内容面上的“表达面”的结构分析和“表达面”与“内容面”的相关关系分析,偏重于深层意蕴阐发,尽量避免过分形式化。

以下就《史记》的文化符号学的研究方向、侧重点及相关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二

《史记》文化符号学的研究重点首先就是它的本体论或本体结构特征,至于代码结构的探寻,应服从这一主题分析。代码结构源于特定的本体结构,并体现某一特定本体结构特征。但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还是本体论。本体论是当代西方哲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那么,什么是本体?什么是本体论呢?所谓本体,指的是事物内部的属性、质的规定性和本源,一般与“现象”相对而言。本体论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意为关于存在、存在物的学说。《史记》的本体论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有两层意思:第一,关于《史记》文本

存在方式的研究;第二,关于《史记》所记历史的存在方式研究。这两个问题本属同一个问题,但略有区别。以下,我们在兼顾二者的同时侧重于前一个层面的分析和研究。

《史记》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简单地回答:就是以语言、形象、类型、神话意象以及理性逻辑建构起来的五种体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合体,“五体”由此就成了《史记》文本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史记》所记历史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以“体大虑周”的完整性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影响着一个又一个历史(文学)文本的诞生,人们终于在与世界文化典籍的比较中发现它是一个独特的不可多得的文化类型,一个中国历史文化最为系统的文本。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这样评价《史记》的完整性、系统性和超越性:

历史学在汉代,也是一种突出发展的学问。在汉以前,中国早已有纪录历史的文献,如《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世本》和《楚汉春秋》等,惟此等史籍无论记言记事,皆简略散漫,断烂成书,一直到汉初,中国尚没有一部有系统的史书,因而历史学也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①

由于《史记》具体、翔实、全面地反映了汉以前的历史文化,故是“中国社会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②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史。

由此可见,《史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精神文明类型是无

① ② 见《中国史纲》第二卷第654~656页,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可比拟的。它作为一种总体文化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和影响,也是其他文本不可企及的。这种影响既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同时也是整体性的。影响所及,既关涉到后一代主体的物质生活,也关涉到后一代主体的精神生活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等等,故尔成为后一代主体从事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史记》突现出来的社会整体性理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然而,任何理论都不是“顶峰”,《史记》亦应当如此。当人们把社会整体性理论从特定文化系统中剥离出来加以无限夸大,使之抽象化的时候,尤其在研究整体性而忘却整体性理论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的时候(因为整体性理论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就有可能将整体性理论永恒化、凝固化,制造出与之相关的种种神话。正是在这一点上,太史公的整体性理论相异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整体性理论。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意义讲,《史记》是科学文本与诗学文本的结合(详见第一章),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舒愤懣”及“成一家言”的意义讲又是历史符号与心灵符号的结合(详见第二章)。仔细阅读《史记》,我们确实能感受到它那诗一般语言表达出来的激情,感觉到作者生命的跃动,看到一个“我”的价值被肯定并为之积极创造的过程同时也看到太史公对世界人生的痛苦反思和自我灵魂的不断拷问过程。毫无疑问,将人的生命加诸无生命的历史本体,必然使本体论的性质和观念产生变化,这样,人们就可能由关注历史事实转入对人的生命、人的命运及司马迁命运的关注。历史本体的这一特征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历史文本的特征。由于历史本体的生命意识转换为历史文本的生命意识,《史记》的整体性才是一个“活”的变动不居的整体性。这是《史记》文本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它与其他文化文本的最大最根本的区别。相形之下,汉儒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思想建构起来的社会整体论却显得僵化而无生气。因为它否定了人的作用,否定人应有的地位和

价值,甚至泯灭了人的种种欲望和需求。他虽然有自己的历史观念,但那不过是一个抽象的超现实也超历史的观念,按照他的历史观念,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只能被动地接受并服从“天人感应”即“人副天数”、“天与人副”的命运安排,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概念的被解释过程。可见,董氏的整体论是一个“死”的存在。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种整体论:前者是开放的整体论。它坚持整体性原则但又不否认个体、部分在社会整体形成中的贡献,不抹煞个体、部分在历史中的价值和作用;后者则是自足封闭的整体论。它坚持整体性,否认个体、部分在社会整体形成中的贡献,从不承认个体、部分在历史中的价值和作用。它们的最大区别乃在于有无生命意识的灌注。司马迁通过《史记》表现出来的本体论构想显然基于他的整体论,因为它同样将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历史性过程,而非一个凝固化、永恒化、绝对化的重复演练过程。因此,司马迁赋予《史记》的哲学不仅是本体论的,而且还是认识论的,这一结构特征决定并制约整个代码结构的风貌。

三

以上意在证明,司马迁灌铸的文化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哲学体系,其本体论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与主体意识和生命的本体论。这一本体论特征既决定《史记》代码结构的特征,亦规范了“成一家言”代码的所指内容。

自古至今,凡对《史记》怀有兴趣的人,无一不在“一家之言”上进行探究,力图做出较为满意的回答:

程金造认为,“读《史记》,不应遗其政理,而思观其事迹。其

‘一家言’的政理,才是全书的灵魂。”^①

张大可说,“‘成一家言’就是要独创一个思想体系,……”^②

白寿彝则认为,成一家言就是要创立一个独立的新的学派。^③

既然太史公有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深且著明之论,学者就可以通过不同角度去接近那个无法直说的“一家言”。但上述较为流行的观点都在“言”什么上即在内容上做文章,从未想到在怎么“言”上做文章,这就是一个漏洞。笔者认为,“成一家之言”除了“言”什么而外,还有怎么“言”的意思。根据辞源上的解释,“言”的第一性是动词(说以及如何说),第二性才是名词(说的内容)。我们平素所说的“一家之说”本身就包括着说的方法在。类似于与 *Langue* 相对立 *Parole*。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怎么说比说什么还重要。结合这一思路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言”,正确解释应该是:在探究天人关系和古今之变的问题上,要创立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认识论),并且还须有一个独到的方法(方法论)。上述三种看法虽然指出“言”的内容,但都未指出“言”的方法。既然这样,作为进入这一符号的方法的改革不仅要在言的内容上作出新的思考,尤其要在“言”的方法上作出新的思考^④;不但要探测出司马迁独特的思想体系,更要寻找出阐述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方法。其实,只要联系《太史公自序》中对各种学说方法论的比较,联系“发愤著书”与“微言讥讽,贬损当世”的意图就不会怀疑我们这种分析的可靠性。那个被后人窥破的“寓论断于叙事”的

① 见《论史记太史公一家言的实践》,1980年作,收入《史记管见》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② 见《试论司马迁一家言》,《西北师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③ 见《说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④ 韩兆琦在《史记通论》中用“矛盾性书法释例”两小节对《史记》的“笔法”作了十分准确的总结,值得我们参考。